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戊午民亭

康学民著

元元《需木专高》研究

泰山出版社

陈元 = 信村 + 利 = 硕父

戚学民著

阮元《儒林传稿》研究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桑兵主编

戚学民 著

阮元《儒林传稿》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元《儒林传稿》研究 / 戚学民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2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ISBN 978-7-108-03791-6

I. ①阮… II. ①戚…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代②儒林传稿—研究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7681号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获得
中山大学 985 和 211 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5

字 数 335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45.0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因缘际会，辑纂《儒林》	17
第二章 汉宋调和与尊汉抑宋	45
第一节 清代官方学术标准：学分汉宋，汉宋调和	47
第二节 阮元个人学术倾向：尊汉抑宋	67
第三章 理学统系	89
第一节 《儒林传稿》对清代理学的系统记载	91
第二节 《儒林传稿》理学史记载的评价	120
第四章 经学阵营	151
第一节 汉学谱系	152
第二节 清学史图景：经学家籍贯分布	178
第三节 《儒林传稿》与“浙东学术”	197
第四节 天算畴人	230

第五章 二卷本《国史儒林传》	245
第一节 《国史儒林传》和《儒林传稿》的联系与区别	246
第二节 《国史儒林传》的成因	260
第三节 《国史儒林传》改订记载的价值	272
第六章 《汉学师承记》与《儒林传稿》	279
第一节 引言	279
第二节 各国史之采择	283
第三节 以汉学为儒学正宗	292
第七章 《宋学渊源记》与《儒林传稿》	309
第一节 取材《二林居集》	310
第二节 呼应《儒林传稿》	329
第八章 《汉学商兑》与《儒林传稿》	343
第一节 回应《儒林传稿》	344
第二节 反击阮著的儒学定义	351
第三节 为理学诸名义辩护	360
第九章 《学案小识》与《儒林传稿》	373
第一节 借用《儒林传稿》文字	374
第二节 批评《儒林传稿》的汉学宗旨	391
第三节 与阮元针锋相对的经学人物记载	405
第四节 似相反而实相成	411
第十章 《国朝先正事略》与《儒林传稿》	420
第一节 借用《儒林传稿》文字	422

第二节 受《儒林传稿》宏观叙学影响	433
结 论	451
后 记	460
参考文献	467

绪 论

阮元在 1810 年至 1812 年间（清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主持辑纂了《儒林传稿》。该书身世复杂，其学术论述内容丰富，流传较广，影响了后来多部清代学术史著作，是清代学术史典型论述之一，但是它曾具有的权威地位和重要影响，却在近代知识和制度的转型过程中被“遗忘”。本书研究阮元《儒林传稿》编纂缘起，分析其论学内容和成绩，揭示其学术反响，以透视清代学术史论述成形和近代知识和制度转型的过程。

本书之所以选择《儒林传稿》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重要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首先，《儒林传稿》是清代国史馆对本朝学术史的初次系统整理，身份非同一般。其次，《儒林传稿》的主要作者阮元是清代考证学者的领袖之一，又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既有学术水平，又对官方学术标准了解较深。阮氏在近两年时间里编辑整理了四十四个正传和五十多人的附传，处理了清代学术史的诸多基本命题，描绘出了清代学术史的某种整体景象，相当富有特色。第三，《儒林传稿》的身世有不少隐秘之处，其修纂、修订和传抄、刊刻等问题均有不少疑点。不同版本之间内容或有差异，涉及清代官方史学的诸多方面，直接影响

2 阮元《儒林传稿》研究

到清代学术史的书写。第四,《儒林传稿》对其后的多种学术史著作有较大的影响,是清代学术史的典型论述之一。第五,《儒林传稿》的命运正与近代知识和制度的转型密切相关,它产生在中国近代史大幕开启的时代,对相关学术史论述的影响深入而持久,对清代学术史论述体系建立有重大帮助,左右了后代认识清代学术的眼光。而它的影响在近代被遗忘,正体现了这个转型过程的重大影响和意义,是近代知识和制度转型的一个缩影。这五个特点正说明了《儒林传稿》的重要价值。

《儒林传稿》对研究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形成过程尤其有重要意义。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史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既是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也是近代新学术的启始时代。面对中国近代遭遇的巨大变局,近代学者在清代学术的基础上,吸收新知,推陈出新,发展出具有特色的近代新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21 世纪,推动学术继续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而总结近代以来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得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既是学术的通则,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

当代学术史论述的兴盛正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清代学者有强烈的自觉和高度的自信,产生了某种特定学术认同,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发展出有关自身的学术史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一套关于其本朝(清代)的学术史论述。这些学术史论述反过来影响了诸多学术见解,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形成过程更与近代知识和制度转型相始终,或为诸多近代学术的形成奠定基础,或者为许多重要学术观点提供助力。在近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有关清代的学术史论述也日益成形。晚清时期,江藩、方东树、唐鉴、李元度、张之洞、

皮锡瑞等^[1]对清代学术史已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归纳总结;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支伟成、侯外庐、张舜徽、杨向奎、周予同等^[2]学者对清代学术进行系统研究,开拓方向,引领风气,探骊得珠,嘉惠学林,功在不朽。前辈学者的智慧凝聚为一个今日教科书上常见的较成形的清代学术史论述,比如清代的学术正统是考证学或称汉学,考证学有吴、皖两派,后来更有扬州学派、常州经今文学派等等。这些见解生动简洁,对系统研究清代学术意义重大,它们本身就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和中国学术近代化的重要表征。

这一较成形的论述及其产生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日益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呈现全新气象,有关研究更加系统,日益深入,新

[1] 江藩著,钟哲点校:《国朝汉学师承记 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方东树:《汉学商兑》,《续修四库全书》第9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唐鉴:《学案小识》,《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8、5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张之洞、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皮锡瑞:《经学历史》,《续修四库全书》第1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章炳麟:《诂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并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文集》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张舜徽:《清儒学记》,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著大量涌现。^{〔1〕}随着有关研究进展,此前相对成形的清代学术史论述也引起学界的关注。李学勤^{〔2〕}、陈祖武^{〔3〕}、戴逸^{〔4〕}、

- 〔1〕 清代学术史研究在新时期以来在各个方面均取得巨大进展,此处仅能列举一二代表性成果,以见一般。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清代学术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有极大成绩:《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大型资料集整理出版;各省市自治区搜集整理出版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如《湖湘丛书》、《福建丛书》、《江苏丛书》、《温州丛书》等等均有相当数量的学术人物文集,国家清史项目也整理出版了众多清代学术人物文献资料,《清经解》、《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1988年)等也重新影印出版,这些大型文献资料丛书使得清代学术史资料极大丰富。清代学术史通论性著作有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1994年;陈祖武等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台湾方面的有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清代学术史研究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2003年;〔美〕Elman, Benjamin A.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ass: Co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e, Havard University, 1984(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日〕近藤光南:《清朝考证学之研究》,研文出版社1987年等等。其他专题著作和单篇论文更多,请参考周惠民主编:《1945—2005年台湾地区清史论著目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马钊主编:《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从经学史角度来说,主要的儒家经典和重要学者均有专题研究,请参阅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和林庆彰、蒋秋华编:《晚清经学研究文献目录,1901—2000》,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呈现多层面、多视角、大幅推进,快速进展的局面,清代各主要学术流派、学术思潮、代表性学者、主要著作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整体面貌更加清晰,学术发展的内外联系得到更多揭示,发展动力和趋势更加显明,总之,今日学界对清代学术史的总体理解和具体认识都大大加深。但是鉴于清代学者和著述众多,清代社会关系复杂,清代学术史研究还有需要填补的空白,诸多基本问题也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本文关注的清代学术论述的成立史即是一个成果众多,但有待深入开掘的课题。

- 〔2〕 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中国学术》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3—229页。

- 〔3〕 陈祖武:《乾嘉学术吴皖分派说商榷》,《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 〔4〕 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高翔^[1]、朱维铮^[2]、林庆彰^[3]、张寿安^[4]、张丽珠^[5]、暴昌洪^[6]、漆永祥^[7]、刘墨^[8]等前辈时贤或对于清代学术史的一些“成说”、“定论”提出了新见，或对清代学者及学术史著作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讨论和深入反思。^[9]这些学者立场与见解不尽相同，似相反而实相成，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相关研究的繁荣，推动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进入新世纪，随着清史工程的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崭新局面正在到来，而对清代学术史论述的丰富成果的系统总结和研究也成为其中必要而现实的课题。

近年诸多学术进展的意义之一即在揭示了近百年来的清代学

-
- [1]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2]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 [3] 杨晋龙主编：《清代扬州学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林庆彰不仅主持多种清代学者文集的整理出版，而且研究乾嘉考据学者的义理学，推进关于扬州学派的研究。林庆彰等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
- [4]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演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5] 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台湾：里仁书局1999年。
- [6] 暴昌洪：《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史学集刊》，1992年第8期。
- [7]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认为乾嘉学术有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
- [8] 刘墨：《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 [9] 某些学者对传统说法提出新见的同时，也有学者对近代以来形成的说法表示支持，如王俊义和戴逸。不同学术观点并存，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术史论述与清代学术史本体之间的差异。清代学术史和清代学术史论述是历史运动本体和历史记述两者的关系，两者既有密切联系，也有差别，不能简单等同。^{〔1〕}现有的成形的清代学术史论述自有其产生的背景、经过和内容，与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具体进程密切相关。在现实层面上，它是一百多年来学术的运动过程所积累的研究成果的总和。在理论方面，它是有别于清代学术史的本体的认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入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本相，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的知识和制度转型过程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对一百多年来的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史的总结反思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今日的成形的清代学术史论述，如前所述，本身即是一百多年的学术研究（历史运动）的重要成果。它凝聚了一百年来学界的智慧，也汇聚了近代政治、社会运动的丰富信息，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即以清代学术史论述而言，今日较权威的论述本身即有复杂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清代学术论述牵涉清代统治者到普通儒生的多个阶层，其不同阶段的不同学术史论著都有丰富的内涵，且多种清代学术史论著之间具有内在的客观的联系，隐然

〔1〕 如李学勤指出，清代学者门户之见很深，对于先秦两汉以来一系列学术史问题的基本见解有违历史本相。见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一文。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5—11页。罗文为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指出梁启超、钱穆二人的清代学术史叙述均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而受到忽视，致使对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存在一定偏颇。张循：《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张文指出，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问题意义重大，但是研究之中必须摆脱一些先人为主的见解，比如不能认为汉宋学之间壁垒分明，必须要回归清人的语境等等。上述这些见解已经触及清代学术史论述研究的关键，即我们对清代学术史的既有认识实非清代学术的真相，而多有后来人的想象。这些学术史常识，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运动中形成的历史，正是本文关注的对象。

构成一个逻辑的链条,形成一定的体系,而今日的认识与此有一定的距离。即此一端,我们可以看出,今日可见的清代学术论述形成史具有较我们已知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多的价值,应该得到专门的研究。

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形成史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的积累,但是相对于其丰富的内涵,有关研究还有相当大的开掘空间。截至目前,有关清代学术史论述形成史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研究偏重在晚清民国时期,即整个学术史的后半段,^{〔1〕}特别是集中在清末民初的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少数学者身上。^{〔2〕}这些著名学者的深厚功力、学术史论述的内涵及其影响当然不容否认,可是从清代学术论述形成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有关论述实多继承前人,是流而非源。早在章炳麟、梁启超之前,有关清代学术史还有复杂的形成过程,现在有关的研究正逐渐深

〔1〕 关于近代以来学术论述史的简要描述,见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7页。最近的成果是武少民:《百年清学研究九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该书集中讨论了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工作,重点讨论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杨向奎、周予同、张舜徽、谢国桢、王树民等人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成绩。有关前半段的学者和著作研究,目前最好的是漆永祥对于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的研究。见氏著:《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 学界对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胡适、钱穆等人的清代学术史论述的专著已经有数种。比如:李帆:《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张昭军:《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锡辉:《文化危机与诠释传统——论梁启超、胡适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诠释与意义》,台北: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雷平:《章太炎、梁启超、钱穆清代学术史论的理路》,湖北大学博士论文,未刊。其他还有更早的如周予同注释的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人,但是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深究。^[1]其二,有关清代学术论述的形成史的研究偏重于民间、在野的学者及其论述,而对清代官方学术论述的研究不足。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对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就官方学术论述进行研究的还不多见。对清代官方学术的价值的评价有不同看法,但是清官方学术对于整个朝代的重要影响是学界承认的。且就清代学术史论述形成史的具体情况而言,清官方的学术论述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当之大,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官方学术论述的研究整体上不够,^[2]造成清代学术论述史缺失了一个方面,使得清代学术论述形成史的内在系统和发展逻辑出现模糊错乱,

[1] 截至目前,对于清代学术论述成立的早期历史,卢钟锋等人进行过一些探讨(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但是对于更加复杂、影响重大的汉学论述史,该书的论述不够充分。对清代学术史论述成立史的研究与乾嘉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现在有关乾嘉学术的研究正逐步展开,对研究清代学术论述的成立史有相当的帮助。如对吴派经学,已经有王应宪的博士论文《清代吴派学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刘墨的博士论文《乾嘉学术的知识谱系》已经关注到乾嘉学术谱系的问题,只是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所依据的乾嘉学术谱系已经是成品,基本是民国以来的清代学术史观念的演绎,与真正乾嘉年间的学术实况有相当的差别。比如,吴派、皖派的名义是晚清时章太炎所立,章学诚就不属于乾嘉时的“乾嘉学派”,而到民国年间地位才真正提高。在此意义上,刘文有了更多的价值。一方面他时有真知灼见,本书将会引述,但是因为没有区分史实与论述,也有一些误判。这大概也可以从另一面说明汉学叙述成立史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2] 这表现在对清代学术史编纂的经验总结时,对清官方学术的认识和估计不足。参阅:李纪祥:《〈清史·儒林传〉纂修之学术史反思——由〈国朝汉学师承记〉到〈清代学术概论〉》,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298页;祁龙威:《读前人清朴学史部分论著札记》,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上述两文均系对清代学术史纂修经验的总结,但均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为清代学术史记述的开端,对清代官方的学术史论述的影响力有所低估,两文所持是近代以来对清代学术论述成立史的权威认知。

影响到这个学术论述形成史整体面貌的呈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层，比如材料较多，研究较难，时间较近沉淀不够等等，而近代以来知识与制度的转型造成对清代官方的评价的变化当是一个重要因素。职是之故，对于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形成史的研究就格外有价值。

可是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形成过程异常复杂，内涵相当繁复，笔者暂无法全盘研究整个过程，故选择从一个较为具体的角度切入，而阮元《儒林传稿》就是一个适合的题目。《儒林传稿》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而后来在研究中进一步认识到其价值。一方面，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重大价值和重要影响一向未得到重视。《儒林传稿》的价值在于，它是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典型和源头之一，其典型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清代官方对本朝顺治至嘉庆初年学术的较早的系统总结，其基本内容奠定了后世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基本格局。本书后面即将有专门的研究讨论。第二，种种情况都显示，《儒林传稿》的编纂、成书到流传都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后世的不少学术史论述都受它影响。《儒林传稿》对晚清多种学术史论著有直接的影响，是联系诸多论著的重要纽带。它是串联起清代学术史的逻辑链条的关键，由此可以深入清代学术史内部的真实生态，理解清代学术史成立过程。第三，《儒林传稿》的编著和修订过程，不仅仅限于技术性层面，而且牵涉清政府和学者的多个层级和多种政治因素，更揭示了清代学术史论述和清代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联系。就这些情况而言，《儒林传稿》实是清代学术史论述的一个重要节点。另一方面，《儒林传稿》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影响，却随着近代社会

历史的变迁及知识和制度的转型而被忘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重要学者有意无意对它加以忽略和贬低。《儒林传稿》的命运正是近代学术知识和制度转型的典型个案和重要后果之一。《儒林传稿》的丰厚的学术内涵，它对后来清代学术史论述的重要影响，和它不受关注的现状，使得对它的研究更有意义。

从清史《儒林传》和阮元研究的角度，均曾有对《儒林传稿》的研究，但是成果的绝对数量不多，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儒林传稿》是后来《清史稿·儒林传》的祖本，从《清史稿》的角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不过《清史稿·儒林传》的全面研究尚待展开，因而对《儒林传稿》的相应研究也不多。^{〔1〕}在阮元研究的视角下，《儒林传稿》也有重要价值，阮元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2〕}，而《儒林传稿》是一部研究较少却又相当重要的著作。无论哪个角度的研究，截至目前均只有少数重要成果，

〔1〕 李兴娟：《〈清史稿·儒林传〉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年第10期，第111—112页。

〔2〕 有关阮元的研究成果较多，详细情况孙广海有很好的归纳，请参阅孙广海：《阮元研究回顾》，《汉学研究通讯》25卷第3期，总第99期，2006年，第1—14页。本文此处仅列举数条，20世纪的清代学术史通论性著作一般均会述及阮元，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阮元的研究逐渐增多。在阮元资料方面，有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出版的《肇经室集》，利用较方便。近期专著有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东辉《阮元与小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钟玉发《阮元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未刊；孙广海：《阮元学术思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刘德美：《阮元学术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王章涛《阮元年谱》，安徽：黄山书社2003年、《阮元评传》，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郭明道《阮元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等。其他单篇论文甚多，不一一列举，涉及阮元学术研究各个方面，请参阅前揭孙广海文。

郭明道的《阮元评传》对此有简单介绍和评点，^{〔1〕}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也曾提及该书。^{〔2〕}陈鸿森的《〈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辨析了冯景、陈树华、焦循等十二篇传记的记载。尽管这些人均在阮纂《儒林传稿》之外，但是有关讨论与《儒林传稿》有较密切的关系，对相关研究有一定帮助。^{〔3〕}马延炜的《清国史馆〈儒林传〉纂修活动考述》^{〔4〕}对整个清《国史儒林传》的修订情况进行了鸟瞰式的研究，较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国史儒林传》的编纂过程，包括了对《儒林传稿》撰修始末的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不过，马文对《儒林传稿》本身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未有研究，而清《国史儒林传》除了史学编纂活动的层面之外，其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学术论述，而有关叙学内容的讨论更为重要。这方面王汎森《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嘉道年间顾祠祭的成立》^{〔5〕}是至今最

〔1〕 郭明道：《阮元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93—295页。王章涛《阮元年谱》对有关《儒林传稿》情况也作了介绍。参见王章涛：《阮元年谱》，安徽：黄山书社2003年，第515—563、1043页。除笔者外，尚有台北中央研究院王汎森等关注阮元《儒林传稿》。

〔2〕 冯文主要介绍了由《儒林传稿》剔除的传记组成的《集传录存》，这是《儒林传稿》的某个部分，但不知何故没有介绍《儒林传稿》本书。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58页。

〔3〕 陈鸿森：《〈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传统中国研究集成》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2—566页。陈氏又有《〈清史稿·儒林传〉考证》一文，是台湾高雄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暨第九届全国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

〔4〕 马延炜：《清国史馆〈儒林传〉纂修活动考述》，《故宫学术季刊》，第25卷第3期，2008年3月，第49—67页。

〔5〕 王汎森：《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嘉道年间顾祠祭的成立》，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2008年3月，第63—94页。除王文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于《儒林传》有些讨论，这些相关成果参见前揭李兴娟文。